

武术推广策略研究

陈青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兰州 730070)

摘要: 通过文献资料、分析推理的方法, 结合西方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影响的典型案例, 分析中华武术的全球化推广策略。认为: 应本着人类文明共享的原则, 以生活方式为基础、器物文化为支撑、精神文化为核心作为中华武术全球化推广的文化战略。将中华武术融入悠闲生活方式之中, 建立“中华武术民俗文化城”或“中华武术民俗文化坊”, 以务实的方式向全球推广中华武术。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 武术; 全球推广; 民俗文化城

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与世长辞, 他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意识, 在现实中也屡屡被验证, 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的确制约着人类的文明共享。文明的冲突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立场上的文化学理论, 亨廷顿在承接美国国防部课题时, 以明确的报国之心完成了这项具有战略性的理论研究, 同时也强化了他的西式民主价值高高在上的观点, 故而这种理论明显地带有局限性和狭隘性。即使如此, 人们从现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文明间的利益, 文化间的鸿沟如此之深。

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 文化的冲突集中于精神层面的不可调和。文明是对人类创造积极、进步文化的集中程度化表现, 它包含着文化, 人类的文明史是社会文化的发展史。文化由物质、社会结构和精神意识等亚系共同构成, 在这些亚系中精神意识可以成为一种文化的代表。因此, 代表一种文化或文明的精神意识每每成为冲突的焦点。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历经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之际, 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奥运会, 全球对中国有了更新的认识。可是, 当中国力争将代表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武术申请列入奥运项目时, 却让人们再次深深地感受到文明间的冲突。如何突破文化的冲突, 走向融合, 实现文明共享, 中国必须以文化战略的思维方式考虑向全球推广中华武术。

一、中华武术全球化进程现状

出于文化猎奇, 也基于文化认识, 世界性的学习中华武术逐步成为潮流。中国不失时机地通过境外武术表演、派出专业教练、实施武术培训、举行武术比赛等形式积极推广中华武术。从上世纪初中华武术开始走向世界以来, 尤其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成立国际武术联合会至今, 100 余个地区和国家建立了武术协会, 从全球 192 个国家的数字上看,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数字, 高达 50% 的比

例。但是, 每个协会所拥有的武术人口却十分可怜, 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与此同时, 西方竞技体育也在中国渗透, 现今已经全面占领中国, 毫不夸张地说除了老年人之外的中国人多以西方竞技体育为体育生活手段。中华民族体育与西方竞技体育全球化的渗透和普及程度相比, 可谓是天壤之别。

中华武术的全球化进程缓慢, 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华民族不具备主动文化外输特征, 中华文明多通过中介文化向外传播; 中华民族性格具备高度的退隐性, 不善张扬; 中华民族文化追求人伦修养, 主要影响人之精神和意识, 不易产生器物层面的直接表现; 中华民族文化成长周期较长, 短期内难现成效。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从属文化形态, 中华武术同样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同时, 我们还会看到国内的武术市场日益萎缩, 武术人口日渐稀少; 武术发展呈竞技武术一花独放, 传统武术百花凋零态势; 武术技术单一化, 简约化, 不仅在民族体育中失语, 且在民族文化中失忆; 武术传人逐渐老化, 武术传播途径过分单一等等趋势, 作为本土文化的发源地、资源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趋势也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中华武术全球化推广进程。在诸多因素中, 我们始终认为它们仅仅是影响和制约中华武术全球化推广的制约因子, 却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中华武术的全球化推广的文化战略失策。最终导致 2001 年后开始积极申请将中华武术列入北京奥运会的一切努力, 换来的仅仅是“2008 年奥运会武术比赛”, 这一结果不过是一项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举行的世界性武术比赛而已。如果说北京奥运会前中华武术全球化推广仅仅是单纯技术推广的话, 那么, 北京奥运会后的中华武术推广就必须考虑整体文化推广。

二、西方文化全球化战略分析

西方文化向东方渗透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近代以传教为主的东扩, 结果以失败告终。第一阶段

的西方文化渗透中，利玛窦是罕见的成功者。利玛窦（P. Mattheus Ricci）在中国能够成功地实施他的传教活动也是得益于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入了解。他在中国传教灵活地运用四个诀窍：首先他把传教建立在广泛地交友基础上，他发展的许多教徒都是他的亲密朋友。其次是他的助手大部分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懂得许多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西方的科学知识，这极大地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目光。第三点就是他把耶稣教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各阶层易于接受的宗教，同时他又充当着将中国的佛教西传的角色。第四点是他本人换去欧式服装，穿上中国佛教徒的僧服，披挂中国士大夫的儒服、儒冠，俨然一幅中国士大夫的样子，被人戏称“西儒”。在利玛窦看来，中国的一切都是陌生而又富有诱惑力的，但是他很难对中国的文化达到深入的了解和掌握，比如他对中国哲学的认识是：“中国所熟悉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是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在这种心态左右之下，决定了利玛窦以拯救者的姿态极力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授西方实用的、客观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其目的是促使人们通过技术器物层面的认同，最终达到对基督教的认可。

利玛窦仅仅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位典型代表，在这个阶段中、西文化互动远非一人所及，它汇集了众多仁人志士的贡献，当然更有百姓们的功劳，中国民众进入教会学校的学习，掌握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形成了相应的意识作为重要保障因素。但是，能够具备利玛窦这样才能的传教士毕竟有限，更多的传教士任务单纯，传教活动的目的就是感召广大的民众皈依基督。他们的策略是失败的，传教士们惊讶地发现皈依他们的信徒与异教徒们一起参加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迷信”活动，这令他们感到十分耻辱。中国人崇祖心理十分强烈，祖先不仅是个体的崇拜对象，也是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重要偶像，宗法制主要依托祖先强大的、纵向的作用得以维持。伦理道德是中国的精神支柱，以基督教置换之简直是大逆不道。在中国人眼中传教士们不但缺乏孝道，还缺乏起码的同情和谦逊。百姓对利玛窦抛弃家人独自来华传教的行为也颇有微词，李灿道：“若利玛窦泛海数万里至中土，曾携父母妻子来乎？彼利氏者，吾不罪其泛海远来之不孝，而罪其离身言孝之为大不孝也。”意识层面的不可调和性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人们不仅疏远基督，更对西方文化敬而远之。这一阶段，西方人以老大自居，没有看清楚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顽强的抗拒能力，更没有看明白博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

第二个阶段是采取优越、舒适的物质生活方式为先导的现代东扩，结果是大获全胜。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使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日益增强，人类社会从体能时代步入智能时代。仰仗生产技术，人类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凌驾于自然之上，

人类相信有了技术这个支点，就可以将地球撬起来，这样的豪言壮语充分地反映了智能时代带给人们的信心。生产技术突破了人类对世界的解释界限，带领人们进入对世界的改造时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根据韦氏辞典，“现代”指大约公元1500年（相当于清朝乾隆统治时期）到当前的这段历史时期。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分为工具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时代四个时代，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是第二次现代化。现代化主要指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简言之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现代化具有加速性，尤其是在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知识时代的加速性表现得十分明显。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早于东方，其生活方式早于东方渐入优越、丰富、舒适的物质生活阶段。西方第二次向全球进行文化渗透过程中，采取了器物先导，意识相随的战略。物质生活的利诱只是一种铺垫，实质性目的是在文化意识上对占领地进行殖民。正如汤林森（John Tomlison）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分析物质先导策略时论述到：“……就是某种东西‘已经为某个地区接受或已经是某个地区习以为常的言行举止’，如何？这个用法，从‘自然而然’转移到了‘历史’的意义，是正确的。”当人们在接触某种新颖的器物时，为之新颖所动，并对这种文化的功效感兴趣的时候，已经说明他们开始接受它了。在汤林森著作的开篇有一张澳洲偏远的塔纳米沙漠中的一家人观看电视的照片，他们席地坐在毛毯、油皮鼓上，或者干脆以沙为椅，电视节目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观看电视实际上隐含着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这些土著人的文化，正受到电视活动内容的威胁。进入现代，西方的各种实用技术和物质生活方式铺天盖地的向中国席卷而来，国人的衣着个性化了，食谱多元化了，居住楼宇化了，出行机械化了，通讯漫游化了，交流网络化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其影响，得其实惠。走稳了第一步，第二步接踵而至，先进的器物文化拥有者开始廉价地掠夺殖民地的各种资源，通过难以摆脱的物质生活有效地帮助它们渗透西方的思想意识，最终完成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的目标，这种侵略较战争温和得多，它不叫“侵略”，而称为“影响”，但这些影响要比战争侵略厉害得多。试看，中国人原本的大一统意识，受到多元文化影响开始变得活跃而漂浮，西方非理性思潮激起了中国人自主意识的涟漪，使中国人思想汹涌激荡，今天他们坦然接受各种西方新异思潮，甚至难辨良莠，反陷迷茫。不过有一点，就是中国人看好西方物质生活方式，没有人能够拒绝。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西方生活方式影响下，工作、生活的节奏明显加快，压力明显增加，发达国家和地区流行的文明病也迅速蔓延于中国大地，导致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国人多达70%以上。西方的竞技体育除给人们带来机体潜能的开发和感官的刺激外，还有对身心的伤害。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东方式悠闲的生活方式，在文化比较中逐渐显现出人的自然化的恒常魅力。中华民族体育文

化给人们提供了健康、快乐和艺术享受,中华民族体育对人性极大地关注,时刻以天人合一为习练宗旨,始终将主客体融为一体,充分凸显对人性的高度尊重。比西方民族体育具备更完善的人文特征。北京奥运会后中华民族体育如何向全球推广,实现文明共享,必然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战略。借鉴西方文明推广之术,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中华武术推广的文化战略。

三、中华武术全球化推广的文化战略

(一) 中华武术全球化推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人类文化史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和历史,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异质文化,同时更应无私地为人类奉献本土文化,中华民族体育是人类体育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推广是健全体育文化系统的必然要求。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更要在现代社会中发挥自身的优势,特别是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后,工业文明对人类产生的强烈异化影响,导致了现代社会中文明病急剧蔓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威胁着社会的有序发展,因此推广东方的自然化生活方式非常必要。

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途径日趋丰富和通畅,特别是信息化给人类文化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使文化交流突破了原有的屏障。作为动态肢体符号的体育文化,以其强大的通约性在当今社会中更加畅行无阻,成为人类文化、文明交融的重要使者。中华武术依托于动态肢体符号,使中华武术推广成为可能。

(二) 中华武术全球化推广的文化战略

中华武术全球化推广有三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彻底改变中华武术技术体系,顺应西方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但邯郸学步只能自我诋毁;要么保持中华武术传统风格,固守原本特征和生存形态,然固步自封只能是自我毁灭;要么进行必要的革新,以世人生活和情趣相吻的形式发展,吐故纳新才是自我实现、全球推广的最佳途径。

既然要吐故纳新,国人就要总结北京奥运会前中华武术单纯技术推广失利的经验和教训,借鉴优越物质生活下西方竞技体育发展的成功战略,设计一套全新的北京奥运会后中华武术推广文化战略,这就是以生活方式为基础、器物文化为支撑、精神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武术全球化推广文化战略。

1. 悠闲的生活方式。第二次现代化与第一次现代化相比,有些变化是新出现的,如网络化、智能化等;有些变化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继承和发展,如政治民主化、平权化等;有些变化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否定”,如工业比重下降、城市居民向郊区迁移、自然主义等。如果说,第一次现代化是对大自然的掠夺和征服,追求的社会目标是加快经济增长。那么,第二次现代化则是对大自然的保护和顺应,其社会目标为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奋斗目标,第二次现代化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生活质量提高,因此一切与人有关的内容更加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主题。其中对悠闲生活方式的追求表现最为明显,这种悠闲的生活方式不仅表现在从城市走向

郊区,最主要的是人的自然化,体育活动是古今中外人们追求人的自然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对于人的自然化,东方文明自始至终都贯穿于悠闲的生活方式之中,以悠闲理念引导人的自然化理想,以悠闲生活塑造人的自然化行为方式,以悠闲体育活动强化人的自然化能力,悠闲构成了东方文明的一大特色,即使进入现代社会东方人对悠闲的追求并未动摇,人们的生活方式力求悠闲,悠闲的体育活动相伴而行,表现尤为突出的恰恰是生活在发达的大都市和滞后的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这两极人群。这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人群都在追求人的自然化,一个是历经人化的自然后返璞归真的人的自然化,一个是始终保持纯真质朴本质的人的自然化。

人类社会追求悠闲的意识和行为,这是中华武术推广的基础。我们将视野放大会发现古罗马人的悠闲欢娱的生活方式表现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十分追求悠闲欢娱,体育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甚至体育活动渗透到洗浴过程中,洗浴是罗马人的最爱,“据公元前33年的统计资料记载,当时的公共浴池多达170个,两个世纪后,增加到950多个。”像三人球等活动就是在浴池中进行的体育活动。古罗马人“后裔”的西方人至今保留着向往悠闲的生活志趣,发明了许多休闲活动内容。现代社会状态下的悠闲已不同于农业社会时期的悠闲,世人享受着异常丰富的悠闲生活。现今可供人们享受悠闲的体育活动门类繁多,有一般户外活动的高尔夫、门球、木球、风筝、信鸽、飞盘、街舞;室内活动的壁球、保龄球、台球、飞镖、棋牌、体育舞蹈;极限与强力运动中的蹦极、攀岩、登山、野营、滑板、轮滑、强力运动;机械运动中的滑翔伞、热气球、摩托艇、漂流、卡丁车;冰雪运动中的滑雪、滑冰;民间体育活动中的舞龙、舞狮、龙舟、秋千、斗牛、跆拳道、剑道、瑜伽;悠闲化的竞技体育有3人篮球、室内5人足球、软式排球、软式网球等。这些内容都历经了长期的筛选,具备了较强文化属性的内容,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并不需要借助广泛的社会载体作为“宿体”,也只不过份地“侵占”其他文化的“领地”,相对独立地接受着历史和世人对它的考验和梳理,逐步纳入到余暇文化之中,成为现代人悠闲生活方式中的重要支柱。

是否能够善度悠闲生活,需要有最基本的余暇时间保证。大约一万年以前,当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人类只有10%的时间用于休闲;当工匠和手工业者出现时,则有17%的时间用于休闲;到了蒸汽机时代,人类将休闲增加到23%;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能将生活中41%的时间用于追求娱乐休闲。这是人类追求悠闲生活方式的直接结果。现代社会为人类提供的更加充裕的余暇时间,为改善人们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如何利用这些余暇时间,取决于人们对时间概念的认识,这种极大受制于地域环境的时间观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悠闲生活方式的感知和行为。例如,在高速运行的美国,群体文化的时间观与主导文化的时间观大不相同。大多数美国土著印第安语言中甚至没有表示秒、分或小时的词。墨西哥裔美国人经常说到“拉美时间”,他们的计时方式与主导文化不同。博古恩和塞恩

(Burgoon and Saine) 注意到: 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文化采用“夏威夷时间”——一种轻松的时间观, 反映了土著夏威夷人不拘礼仪的自然生活方式。萨摩亚群岛中, 有种叫“椰子时间”的时间观, 这种观点认为不必去摘椰子, 椰子到时候自然会掉下来。非裔美国人常常使用“BPT”(黑人时间)或“松弛时间”。拥有这样自然时间观的人群, 其生活方式多为悠闲式的。拥有悠闲的时间观, 具备享受悠闲的意识, 加上余暇时间保证, 通过悠闲的生活行为, 悠闲的生活方式自然建立。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格外追求安逸的生活, 田园理想是每个中国人的夙愿, “因过竹院逢僧话, 又得浮生半日闲。”田园理想, 构成了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深刻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使其生活理想发生特化, 无论生活节奏是否与之一致。中国社会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只能导致缓慢的生活方式, 引发悠闲的生活志趣。随着生产方式向现代化转移, 社会进程的加速, 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更加渴望能有恬静的生活予以调节, 以缓解工作、生活带来的压力。这一点从大都市居民追求夜生活现象中可以得到佐证。在中国悠闲生活方式中, 民族体育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华民族体育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达成了高度默契。如果将中华民族体育各类活动内容进行归类分析, 能够纳入休闲类的项目数目庞大。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中大多追求一个“养”字, “养”乃养生、修身。中华民族的传统身体活动实际上多为悠闲的, 人们追求中和均衡, 清静安逸的生活, 以养为体的身体活动内容成为实现人生理想、生活目标的有效载体。因此, 在情况之下中国诞生了温文尔雅的射礼、投壶、围棋、弹棋、太极等, 出现了静态的体育, 如养生、禅坐、气功、棋牌、武当武术等, 这些内容与动态的体育活动对立协调, 形成和谐体育的有机构成。即使在动态的、充满激烈对抗属性的内容中“和合”也总是形影不离, 中国人虽佩剑, 却以舞剑为趣而以击剑为羞; 中国人虽用拳, 却有拳术之习而无拳击之争。概括地讲, 与白热化较量所熏染的西方竞技体育相比, 东方民族体育中难觅激烈、残酷的竞争。“反者道之动”, 当人们经历过一段时间现代化生活和竞技体育实践后, 对悠闲的体育活动倍加青睐, 近年来盛行的各种休闲健身俱乐部, 去竞技化的体育活动不同程度的反映出人类的生活价值取向。在不同社会环境中, 对人的规范教育, 以及所形成的社会资本迥然不同。长期的养生修炼, 可以蓄积有机体的健康资本。不断的“和合”体育习练可使人们更广泛地接触异质文化, 有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文化规范体系, 提高社会的文化资本。同时, 柔和的民族体育所塑造的“温良”(林语堂)民族性格可避免文化交融中的偏激, 为人类全面、健康、和谐的发展提供人文资源和社会资本。

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在带给人类便利的同时, 也产生了异化, 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社会竞争激化、人类有机体弱化、人们道德精神淡化、人类疾病文明化……这一切严重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 人类不应该在高压、紧张的, 人化的自然环境中生活, 物质财富的积累是为了人类悠然地享受健康的物质生活, 自然地品味高雅的

精神生活。

2. 人本的生活内容。中国曾经成功地向全球推广了茶文化, 这是建立在改造人们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文化推广, 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武术等民族体育的推广必须构建在人本生活内容的基础上。在向全球推广过程中, 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唐人街”、华人社区、孔子学院、留学生社区、援外人员驻地、驻外商人圈等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 建立“中华武术民俗文化城”或“中华武术民俗文化坊”。在这个文化城、坊中, 以经过适当改造的, 符合当今社会物质、精神生活要求的, 高度竞技艺术化的, 人文伦理的中华武术为主, 辅以东方式的生活内容, 营造一种人的自然化的悠闲生活方式。其中武术文化包含着健身、防身、养生、保健、娱乐、休闲、艺术、竞技、修养、道德等多维并存的生活内容体系, 并与生活方式高度融合。通过多层次组织结构, 展现文化功能以求产生全方位的吸引力, 感染和引导人们对东方生活方式的向往。我们可以设想, 在文化城或坊中以太极拳为突破口, 首先吸引中老年人体验养生生活, 使他们成为中华武术的代言人; 以中国式摔跤、散打、竞技武术等内容吸引青少年体验竞技, 使他们成为中华武术的传播中介。通过传统武术引导人们品味东方竞技艺术, 通过武术传习感悟中华武德和东方伦理。充分发挥动态肢体符号生动、形象的特点, 有效地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思想, 如通过太极、形意、八卦等拳种传习生动简约的哲理。同时, 配合中华武术的传习, 辅以茶艺、中餐、戏曲、垂钓、书画、棋琴、儒学和道家知识讲座等为生活必备内容, 使人们全面体验东方悠闲生活, 感知中华民族文化, 逐步接受这种能够有效缓解紧迫感, 陶冶情操, 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

在悠闲的生活方式中, 采取人本的生活内容, 可将人放在应有的地位, 充分尊重人的价值, 消除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影响。在此东方民族体育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资源, 这些资源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将人摆在中心地位, 所谓“天地人”, 人处于天地之间, 得益于大自然的抚育, 使人的生存和发展始终保持良性状态, 维持在天人合一秩序之中。在中华民族体育文化, 特别是中华武术中格外强调内外兼修、神形兼备, 完美地实现着主客体的融一, 体现着对人性的尊重和关怀, 这一点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西方竞技体育难以与之相提并论。这种具备高度主客合一的东方人体文化, 体现了人类对人化自然发展的顽强抗衡, 标志着人类对自然化人前进方向的永恒追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 充分尊重人, 将人融入大自然之中, 使之成为它的有机分子, 促进社会有序发展, 必须依托于具体的载体来完成这个历程, 活跃、生动、具体、丰富的东方人体文化是人类文化行为中最有效的中介之一。

博大的中华武术体系可充盈人们的休闲生活, 当人类经历了“快餐”式文化之后, 逐步认识到丰厚底蕴的文化更加令人心驰神往。大凡是难以轻易掌握的文化内容, 如西方古典音乐、艺术作品、中华武术等, 总是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些文化一旦被人们认识和掌握, 就能够给人们

(下转第 158 页)

点必须认识到,那就是变迁是发展永恒不变的主题。京族三岛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京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不管是文化的内涵还是文化的具体形态,都在发生着变化。

这种改变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来说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因为太急功近利的发展将会弱化、甚至丢失京族传统体育的海洋性和民族性文化特征。而不可再生性是文化生态的特点之一,传统风格如果一旦变异、历史文化遗产一旦毁损,将是人类文明的损失和历史的遗憾。从这一点上来讲,保护文化生态的重要性是非常深远的。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创新才是最有效的保护,用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G. Gadamer)的话来说就是:“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9]。只有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努力组建新的、适宜的文化生态环境,扬弃地继承祖辈的传统文化,才能保住京族传统体育的载体和源头,保持其海洋性、民族性的文化特色,使其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上接第154页)

带来持久的乐趣,能够全面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能够陶冶人的情操。人们学习和掌握它们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人们在经历艰辛的学习后,绝对不轻易放弃这些文化。相反易得之物,弃之无憾,如流行歌曲、飞盘、呼啦圈等等很快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因此,不应因为中华武术需要漫长的学习而担忧,这恰恰是中华武术的魔力所在。只要我们做好整体推广策略,这些问题则迎刃而解。

政府应高度重视这种“渺小”的举措,因为小雪球会引发雪崩,手枪扳机能产生强大爆破力,这些例子说明一个小的作用力经过物理过程会产生巨大能量,引发重大变化,这就是“扳机机制”(trigger mechanism)。文化互动同样存在一些看似微乎其微的活动,但却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中国乒乓球队出访美国打破了中美之间的坚冰,产生巨大国际影响。NBA中一位中国球员姚明的身影,感召了中国亿万孩童对篮球运动的狂热和执著。这类事件虽非物理过程,但是人类社会的文化过程与之相仿,甚至其后作用更为强烈。中华武术必须自信,要看到人类社会过程中个体和民族意志的决定性作用,因为“世界历史”就是一个特殊的生活形态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他人,并把自己的自由作为根本的“理性”和“普遍的东西”展开和确立“世界精神”的过程。通过在海外建立一系列世外桃源式的、具备丰富物质基础的“中华武术民俗文化城”或“中华武术民俗文化坊”,利用“扳机机制”,以点带面,追求最大“油点扩布”效应。皮尔森(C.A. van peursen)研究

参考文献:

- [1] 戴斗勇.文化生态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 [2] 出自国家统计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390~1430.
- [3] 《京族简史》编写组.京族简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6.
- [4] 《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232.
- [5] 杨一江.京族宗法制存在形态初探[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42.
- [6]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135.
- [7] 马居里,陈家柳.京族.广西东兴市山心村调查[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160~162.
- [8] 周建新,吕俊彪.从边缘到前沿[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78~290.
- [9]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62.

认为:“扳机机制只能以伦理规则为背景才能起作用”。中华武术必须借助凸显健康、和谐意识,强调人本、自然伦理的普世生活方式,充分发挥具有强大优势的中华武德之伦理功效,使文化过程产生更为强大的聚变。

北京奥运会后中华武术全球化推广的文化战略必须构建在特色化生活方式基础上,以充实的器物生活为支柱,以深邃的东方哲理为精神核心,将中华武术有机融入其中,整体性地将东方人体文化推广到全球,以飨人类。

参考文献:

- [1] [意] 利玛窦,[比] 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3.
- [2] [英]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8.
- [3] [法] 让·诺埃尔·罗伯特.古罗马人的欢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3.
- [4] 胡小明,虞重干.体育休闲娱乐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
- [5] [美] 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跨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6.
- [6] 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12,127.
- [7] [荷]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78.
- [8]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1.